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汉语国际教育与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逢增玉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非外借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逢增玉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 逢增玉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5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ISBN 978-7-5657-2228-8

I. ①汉… II. ①逢…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②中华文化—文化传播—研究 IV. ①H195.3 ②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3310 号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HANYU GUOJI JIAOYU YU ZHONGGUO WENHUA GUOJI CHUANBO

主 编 逢增玉
责任编辑 刘广东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81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228-8/H·2228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本书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中心) 科研成果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文化研究

“满映”——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建立与运转	逢增玉 / 3
“语”的表达与运用:中外文化比较之一面	彭宗平 / 30
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微观解析——特效字幕	包学菊 / 44
脱离历史语境的留学生文化教学之商榷	李玥阳 / 50
中国电影文化在孔子学院的传播策略研究	孙玉红 / 54
说不尽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	乐 琦 / 63
“戏仿”的狂欢	
——后现代语境下“戏仿”的盛行	乐 琦 / 69

第二部分 语言本体研究

“当年”习得中偏误和回避现象原因解析	刘海燕 / 79
朗读语体的重音特征研究	陈玉东 / 89
“比较好”和“好”的级次问题	司红霞 贾 静 潘文璐 / 101
也论句尾“了”的语法意义	邹海清 / 109
汉语语体的多角度考察	蒋成峰 / 118
助动词“能”的产生	刘 妍 / 128
现代汉语社会称谓的分类	孙现瑶 / 131
供用句的语义特征及制约因素	邹海清 / 146

第三部分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慕课时代的大学教学改革

——谈谈“翻转课堂”带给我们的启发 张 婧 / 155

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韵律问题 陈玉东 / 160

再谈中高级口语课的“精讲多练” 侯亚光 / 168

中高级阶段的语篇教学 高 玮 / 172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语音课程研究

——以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为例 任前方 / 183

初级汉语教材中补语项目编排顺序的考察与分析 肖 莉 / 190

第四部分 传媒语言研究

历史文献纪录片话语中的转述语研究

——以《敦煌》为例 高 磊 / 201

消极修辞的几种手段

——以广播新闻话语为例 蒋成峰 / 219

话语与影像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的协作机制研究 高 磊 / 225

第一部分

文化研究

“满映”——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建立与运转

逢增玉

作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和艺术结合的方式,电影自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巨大的受众和市场,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的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它在影像、音乐、画面中带有宣传作用,也是其他宣传工具望尘莫及的。尽管是温柔的艺术形式,但电影本质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从早期电影到现在的好莱坞大片莫不如此。这种艺术化的意识形态机器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意识形态霸权、政治革命夺权和宣传鼓动大众方面的作用,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由精神影响最终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能量,即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是精神思想的,归根结底也是物化的。因此,它在革命夺权、建构民族国家及国家机器过程中,得到极大重视。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作为革命领袖集团成员和苏联红军建立者的托洛茨基最早提出“电影宣传论”的理念,他在1923年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插手电影,这表明我们就算说不上愚蠢,也够笨、够无知的。因为这是最好的宣传工具,而且它有办法将自己树为工具。电影应该抗衡酒精和宗教的诱惑,电影院应该取代酒吧和教堂,为大众教育提供支持。”^①

20世纪30年代由街头暴力集团成员成为纳粹德国元首的希特勒,也非常重视电影的宣传作用。1934年,纳粹德国文化部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为了赢得更多的权力和更便于控制电影,着手修改了《帝国电影法》,并且在1934年2月16日宣布其正式生效。该法令旨在鼓励更多“有益电影”的产生并且消灭一切“有害电影”。此法令规定了从三个方面管制电影:“强制性的剧本审查”“枪毙不合格的电影”“一定的物质奖励”。在这样的控制与诱惑下,《意志的胜利》^②等代表法西斯主义电影美学的影片出现,并一度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即便纳粹德国战败后,里芬施塔尔创制的法西斯主义电影美学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

① 马克费罗. 电影和历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9.

② 《意志的胜利》影片导演是里芬施塔尔,她是德国电影界一位著名人物,在电影艺术领域成就颇高,但因为其与德国纳粹合作的经历,所以又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其为纳粹拍摄的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曾获1935年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至今仍被研讨。

作为后起的法西斯国家的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并建立傀儡性质的伪满洲国后,也在东北建立了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大量宣传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国策”电影,是典型的宣传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电影机构。

一、伪满洲国建立之初的思想文化统治与电影活动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帝国主义便在伪政府中设立了思想统治机构,宣传其所谓的“建国精神”,“资政局弘法处”就是这样的部门。该部门主要承担三项任务:第一项,所谓“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第二项,“涵养民力,善导民心”,实际上是妄图用“文治”征服民心,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三项,“普及自治思想”,目的是向东北民众灌输“独立”思想,以便为把东北从整个中国分割开来的行径制造合法性。而在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后来“情报处”还统管伪满洲国的新闻、出版、广播等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由日本人统揽“国务院”大权,“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根据伪法令,“弘报处”任务扩大为九项:(一)控制舆论;(二)控制文艺;(三)主管“主要政策之发表”;(四)领导和监督新闻机关;(五)控制宣传资料;(六)管理出版物、影片及其他宣传品;(七)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八)掌管情报;(九)除上述诸项外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此外“弘报处”设立了三个科:“监理科”,主要监督管理文化宣传机构,以及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调查;“情报科”,主要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通报,以及加强情报联系和控制的工作;“宣传科”,掌管宣传计划和宣传联络工作,以及对内对外重要文化宣传的开展。

文化的载体无疑成为日本控制的核心。比如对于文学的“新建设”,日伪对“满洲文学”的定位就是,“满洲国”是“奉戴满族皇帝,日、鲜、汉、蒙团结一致而形成的国家”,其中日本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满洲文学”“要以日本文学为主轴”,“以日文为主体来创造满洲文学,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至于世界文学的要意,则是“以建国精神为基调,体现‘世界一家’的伟大精神,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文艺为经,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艺为纬,吸取世界文艺精华,组成浑然独立的文艺”^①。

电影是文化中最为直观的表象,最易被接受,自然也就成了日伪重视的工具之一。当时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就希望通过影像去重塑东北人民的价值观。此前,东北电影市

^① 王向远. 日本侵华史研究[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82.

场以放映上海电影和进口译制片为主。日本关东军等策划占领电影阵地,垄断东北的电影事业,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日本是以纳粹德国为楷模的,要建立殖民地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全面统治的体制。当时,日本国内正在积极地利用电影这个“强大的力量”。在纳粹德国的《帝国电影法》修改一个月后,日本内阁也通过了《电影统治委员会规程》,规定国家全面干预电影企业。而且这个统治委员会“为了更有力地发挥电影具有的文化效果,新成立了一个官民合办的团体——财团法人大日本电影协会,以便推进电影事业的发展”。^①“本电影协会为了改进和发展我国电影事业,促使出现健康的娱乐影片,使电影对充实与提高国民生活,维持和革新社会风化做出贡献,并进而使电影实现大日本帝国的国策,不消说一朝有事之际,即使是在平时,电影也要在政治和外交上充分发挥它所特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以收电影报国之效……”^②日本效仿纳粹德国的《帝国电影法》并将其用在国内,进行越来越严酷的思想文化统治和整肃,逮捕大批的左翼作家和电影人,把整个国家的电影生产与宣传都绑架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同时也在殖民地次第设立电影文化机构。

正因日本深刻地认识到电影作为教化工具的重要性,所以早在20世纪20年代,“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就设立了映画班,摄制了大量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服务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主要以日军侵占东北诸城市为内容,跟随日军关东军到侵占的城市进行现场拍摄,并在日本国内和当时“满铁”的沿线城市放映,用以宣传日军所谓的“辉煌战绩”,宣传他们的“军功”,为其殖民统治服务。据史料记载: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辽东半岛,并于1906年在大连成立了“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表面上经营南满铁路,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1923年(日本大正十二年),“满铁”设立了弘报系,出版书刊、照片等,广泛向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宣传和思想渗透。1928年(日本昭和三年),“满铁”将原隶属社长室文书课的映画班改由弘报系领导,由芥川光藏主持。映画班是负责拍摄电影的,“满铁”将其合并到弘报系,使文字宣传和影像宣传合二为一,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加强舆论宣传力量。映画班内设办公室、机械器材室、编辑室、洗印所等机构,配备业务人员20名。1936年(伪康德三年,日本昭和十一年)10月,“满铁”将映画班扩充壮大,成立“满铁映画制作所”,由芥川光藏任所长。

“满铁”映画班成立后,立即开展纪录影片的拍摄和放映宣传活动。“九·一八”

① 岩崎昶.日本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150-151.

② 同上。

事变乃至其后日本关东军大肆侵犯吉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地时，“满铁”映画班派人现场拍摄事情的经过，编辑成3部纪录片，由“满铁”弘报系周密组成4个宣传班，在日本国内各地和我国铁路沿线及台湾放映。此外，在日本关东军直接操纵下，“满铁”与当时拼凑起来的汉奸组织“自治指导部”密切配合，于1932年2月分成两个宣传放映班，对我国东北各地进行“宣抚”放映。伪满洲国建立后，“满铁”拍纪录片题材更加广泛，但着力点仍围绕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等侵略及经济掠夺和对人民的奴役。仅1932年（日本昭和七年），就拍摄了8部影片，并广泛放映。1933年（伪大同二年，日本昭和八年）至1936年拍摄纪录片的领域更加扩大，并突出重点地录制放映。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全面加快拍摄进程，录制完成20多部纪录片，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广泛放映宣传。^①

由此可以看出，“满铁”映画班从建立之初就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宣传日本所谓的“丰功伟绩”，从而成为日本电影宣传的“先驱”。史料中提及的映画班拍摄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3部纪录片，分别是“记录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的经过及日本关东军向吉林、长春等地的侵犯活动”的《满蒙破邪行·第一篇》，“记录了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越过洮南铁路，向齐齐哈尔侵犯”的《满蒙破邪行·第二篇》，以及“记录了1931年12月末到1932年1月间日本关东军入侵锦州、山海关等地的经过及‘满铁’为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抢修沈阳至山海关铁路的情况”的《辽西剿匪》。^②《满蒙破邪行》《辽西剿匪》，主要内容是日本关东军大肆侵略东北，但“满铁”却称之为“破邪行”“剿匪”，这无疑是将日本的侵略行为颠倒成“带有责任”的“正义”行动，宣传关东军的“军功”，同时也在满足日本的“殖民梦”。影片完成后，“满铁”宣传班携片沿“满铁”铁路沿线各城镇放映。

此外，在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满铁”映画班为了配合日伪殖民统治，就更不遗余力地对东北沦陷区进行宣传教育，鼓吹“日满一体”“五族协和”。在伪满洲国“建国”的1932年，映画班就拍摄了8部影片，比如由“满铁弘报系”摄制的《建国之春》。影片是无声片，为了便于宣传，分别采用了汉文、日文、蒙文三种字幕，主要内容为1932年3月8日溥仪一行从汤岗子前往长春就任伪职的情况，详细记录了途中的“欢迎”活动以及溥仪到任后各地“热烈庆祝”的场面，影片中反复出现大量的集会、阅兵、宣讲场面，还出现民众“欢呼”的场面。此外，影片为了渲染“新建国”的气氛，采用直接表意的符号元素，如各家都挂起彩灯，并贴出“庆祝新国家”“东亚和平”的对联，亮起

① 陈威利. 伪满铁和满映都干了些什么? [J]. 长春宣传, 2001(2).

② 胡昶, 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6-17.

“满洲建国万岁”的彩灯等。《影像作为符号》一文认为：“在电影中，意义和所指物合而为一，它是通过自身表达意义的，即直接表达意义。”^①这些影片使观众在观看时，不断地接收到这些元素符号强化的印象，最终达到宣传的目的。

扩充后的“满铁映画制作所”更是进入了大规模的生产时期，仅“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全面加快拍摄进程，录制完成20多部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在《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一书中有详尽的列举：

生产方面有：《日满间货物运输》《大豆工业》《抚顺煤炭》《铁路建设实况》《农业满洲》《北满移民》《间岛省朝鲜移民》《铁路爱护村的移民》；观光方面有：《观光日本》《周游满洲》《哈尔滨之夏》《北满避暑地巴林》《北戴河》；军事方面有：《五市防空演习》《日支事变》；其他方面有：《庆祝满洲、德国、意大利通商协定签订》《跃进满都》《废除治外法权》《蒙古忠灵塔揭幕式》《满铁社员在各地》，并重点拍摄《满铁三十年》。^②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映画制作所”较前期“映画班”涉猎的领域更加广泛，几乎囊括了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配合日伪政策的宣传。比如《北满移民》就配合了当时日本的移民政策。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制订了500万户移民计划，到了1932年1月，关东军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满蒙移民事业计划书》，计划书中详细阐述了希望通过移民，使日本人取得“满蒙新国家”的支配地位，所以在伪满洲国建立后，日伪就将移民政策作为“国策”之一加以推行；又如生产方面的影片则是配合并宣传日伪的“产业计划”；再如观光类的影片都是在宣传“日满一体”的“协和”精神，政治倾向极为露骨。而这些影片的拍摄经验完全为后来的“满映”制作的“文化映画”所汲取。

其实，在伪满洲国建立后，除了“满铁”自己拍摄影片，伪满洲国的各部门看到电影巨大的宣传功效，为了“抚化”东北民众，也在积极地购置电影设备并委托“满铁”拍摄影片。如1933年，伪满洲国国务院情报处就与“满铁”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新兴满洲全貌》，介绍当时的“满洲”；而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建立的“满洲协和会”，也曾经委托“满铁”拍摄了纪录片《结成协和》。除了委托“满铁”拍摄影片，伪满洲国各部门也在摩拳擦掌地购买电影相关器材，积极拍摄各种宣传影片。1938年8月，“伪治安部军政司，还发表了‘利用电影之宣传计划’，并拨出相当充裕的预算进行电影活动，由日

① 米特里. 影像作为符号[M]//李恒基, 杨远婴.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283.

② 胡昶, 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9.

本松竹公司协助,拍摄了《满洲国军之全貌》《光辉的满洲国军》《满军武官访问日本》《特别大演习》《观舰式》等一批纪录片。共制作 21 种 167 本,购入无声影片 127 本,有声片 225 本,共花经费 10 万元。该部在各军管区有常备演影班……其电影活动和拥有的设备,在满洲各部中都是最多的”。^① 其他的部门如伪民生部、伪国都建设局、伪教育部也都有自己的电影活动。除此以外,为了更好地宣传电影,伪满洲国各部还定期组织映画班到各地巡演。比如,伪教育部就曾组织映画班在各地巡映,并发布文件宣称:“映画教育在社会教育上占极重要位置,故本部不遗余力积极提倡。又以我国民智低浅,常识缺乏,用此映画教育,匪独适合社会人心之所好,即对于增广见闻、启迪智慧、善导思想诸大端,收效之大,当亦无出其右者。”^②据考证,仅从 1933 年 9 月到 11 月两个月间伪教育部就巡映两次,一次地点在兴安总署管辖的巴尔虎甘珠尔庙,共放映了三场,观众总数约 6 500 人;另一次在热河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巡映的影片有《友邦日本使节》《访日满洲国童子军》《建国预告篇》《黑龙江省水害实况》《建国纪念运动会实况》等。

二、殖民宣传“国策”炮制的“满映”

如上所述,在伪满洲国建立以后,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沦陷区人民,宣传“建国精神”,“满映”与伪满洲国各部都非常重视电影这一宣传工具。但是各部以及“满映映画制作所”制作的影片都是一些纪录片,并不能引起东北民众的兴趣,也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放映,而且当时在满洲影院放映的片子以上海和美国等地的影片为主,所以日军决意要对当时的东北电影市场进行垄断,建立电影的统治机构。

1933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少佐最早提出这个构想,这一提议迅速得到了关东军和伪满洲国警察部门的支持,并于同年 8 月 28 日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召开了“满洲国策电影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当时的关东军成员、伪民政部成员、伪文教部成员以及伪国务院总务厅成员参加,与会人员达成一致,“提出了建立电影国策研究会的目的是,在满洲国文化向上发展的时期,致力于电影的利用和普及,研究制定全国电影的制作、检查和统一管理等有关事项。会议还选举了研究会的领导成员”^③。当时确定的 4 名领导成员中有 2 人隶属关东军,分别是提出建立电影机构的关东军少佐小林和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志村。由此可见关东军对于建立电影机构的不

① 胡昶,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北京:中华书局,1990:20-21.

② 任其铎.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D].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06.

③ 胡昶,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北京:中华书局,1990:21-23.

遗余力。而在第一次会议后的十余天,1933年9月14日,伪首都警察总监再次向伪民政部警务司司长提交了关于设立“满洲电影研究会”的文件,该文件宣称:

自去年以来,曾多次向日本人及关东军提出对制片及电影摄制活动给予援助的请求,而被那些权威人士以为时尚早为由加以拒绝。根据目前国内状况,通过电影来使国民了解国情,并通过教育性的影片提高满洲国民的文化水平,乃是当务之急。因此,应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尽快建立一个能促进满洲电影健康发展的指导机构,电影研究会就电影输出、输入,其他国家教育电影状况及对电影企业减免税等法律,都进行研究。^①

可见,当时关东军和伪警察部门对于建立电影控制中枢机构的愿望是迫切的,之后又经过多次的商议酝酿,并汲取了当时德意法西斯对于电影控制的经验,认为“国家电影”统治机构有巨大的强制力和教化力。“国策电影研究会”最终决定成立政府管辖之下的“国策”电影机构,以统一电影的摄制及放映活动。经过几年的筹备,在1936年7月,该会正式提出了“《满洲国电影对策树立案》”,该方案的主要方针为:“为了制定满洲国电影政策,应首先设立一个审议和准备机构”,并详尽说明了要设立这一机构的“充足”理由:

一、目前几乎没有一部电影是适宜于指导教化满洲国民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

二、目前满洲国内上映最多的影片为美国、上海以及日本的影片。这些影片有很多是不利于满洲国的治安工作以及国民思想教育的。对此,有必要加以迅速制止。

以上皆因无其他影片代替而造成。

三、电影事业的保护、奖励制度以及相关的调查、研究机关颇不健全、不统一,有关这些问题的法律条令亦不十分健全。

四、满洲国政府各部以及协和会、满铁分别进行电影制作,这些在经济上很不合适。由于满洲没有电影方面的权威机构,不仅导致有限的经费分散使用,造成设备、机械、劳务和旅差等项费用重复支出,而且也只能摄制一些幼稚、低级的影片。

五、日本电影公司现在进入满洲拍片,在经济上也感到困难。倘若他们进入这里拍片,日本的制作活动也会停止。

基于以上理由,有必要尽快成立国策电影机构。该机构可置于政府管辖之下,亦可使其从属于政府内的某一局或者像弘报协会那样。这些尚需研究。但是首先应设

^① 胡昶,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北京:中华书局,1990:26-27.

立一个审议和准备委员会,就有关的立案问题进行研究和审议。^①

“电影研究会”认识到“满铁”和伪满洲国各部的电影活动在经济方面尚不能达到很好的统筹,形成的局面过于分散,也就无从抵制上海片和美国片。据记载,当时美国输入伪满洲国的影片一年就达到 800 多件,此外还有上海片 300 多件以及一些欧洲片,相比之下,伪满洲国不但没有可以输出的影片,甚至在“本土”都没有可以占领市场的影片。而当时日本输入伪满洲国的影片也不过 100 多件,无法形成强大的“攻势”。除此之外,这些影片也没有发挥日本所希望的“教化良民”的作用,虽然当时的伪满洲国弘报处已经对输入影片严格检查,但也还有像《大路》^②这样的左翼电影的代表作,以及像《风云儿女》^③这样抗日情绪明显的影片上演。这些影片无疑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这对日伪来说是个“沉痛的教训”。基于这些原因,“电影研究会”认为建立一个电影权威机构已经“迫在眉睫”。在此议案提出以后,伪满洲国也很快建立了电影“国策”审议委员会和准备委员会,审议委员会由 20 人组成,由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少将任委员长。而准备委员会由 10 人组成,由日本关东军参谋稻村中佐任委员长。可见日本关东军从一开始就将电影机构的建立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

1937 年 8 月 2 日,经过商议与准备,伪满洲国国务院最终通过了“《电影国策案》”,商议由伪满洲国和“满铁”各出资一半,共投资 500 万元兴建“满映”,“打造远东最大电影厂”。同月 14 日,由伪满洲国政府正式颁布《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并在当时行销东北的头号大报,也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主要舆论阵地的《盛京时报》号外上刊登。全文加上附则共 26 条,内容涉及电影机构的各个方面,为“满映”机构建立的“蓝本”,《盛京时报》当时刊登的具体内容为:

本月二日国务院会议提议可决时日,经参议府咨询完了之敕令“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十二日公布,昨年来悬案之国策映画制作会社、于兹拥有五百万元资本堂堂诞生。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会法:

第一条 政府为制作映画、输出入及配合指导统治,俾映画事业健全发展,设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

① 胡昶,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 北京:中华书局,1990:26.

② 1934 年,影片由孙瑜导演,主要讲述以主人公金哥为代表的工人为了抗日,志愿去修筑军用铁路的故事。

③ 1935 年,影片描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知识分子辛白华走上抗日前线的历程,它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第二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以经营下列各项事业为目的,为股份有限公司。

- 一、映画之制作;
- 二、映画之输入;
- 三、映画之配给。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经国务总理大臣认可,可营前项事业附带之业务。

第三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本部设置于新京特别市。

第四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之资本额,为五百万元,内二百五十万元,由政府出资。

第五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之股份,取记名式,一股金额为五十元。

第六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之股份,非得会社之意不得让与他人。

第七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之股金第一回缴纳额,得缴股金额四分之一。

第八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之股东之一有一个决议权。

第九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置理事长一人,理事三人及兼事二人。

第十条 理事长代表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总理其业务,理事长有事故时,理事之一人行其职务。理事辅佐理事长,掌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业务。

监事监察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业务。

第十一条 理事长、理事及兼事,在股东会选任职,理事长及理事之任期为四年,监事任期为三年。

第十二条 理事长、理事及监事任期终了后,在继任者就任前仍得行使其职务。

第十三条 理事长、理事及监事,未经国务总理大臣许可,不得从事其他业务。

第十四条 国务总理大臣对于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事业,可以发布公益上必要的命令。

第十五条 国务总理大臣对于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事业,可以发布监督上必要的命令。

第十六条 关于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理事长、理事及监事之选任或解任,公司章程的变更、合并及解散,社债之募集及盈利之分配等有关决议,非经国务总理大臣的认可,不生其效力。

第十七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每营业年度,定事业计划时,须事前向国务总理大臣提出,对其计划执行中发生重大变更时,亦应同此办理。

第十八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非经国务总理大臣认可,不得对其事业废止或休止。

第十九条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非经国务总理大臣认可,不得将其重要财产转